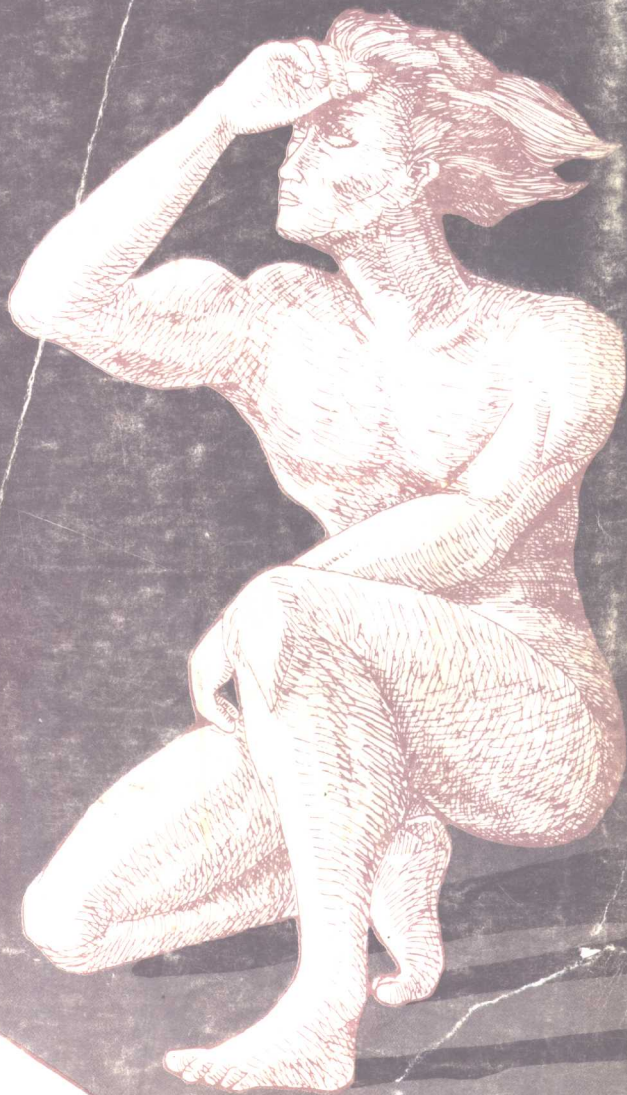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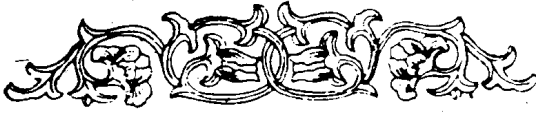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

金耀基等著

朱雲漢 ● 彭懷恩 編





第一編
導論



金耀基

中國現代化的動向： 一些觀察與反省

一

傳統的古典的中國，近百年來，遭遇到亙古未有的挑戰，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形變。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屈辱的世紀，也是一個尋求富強光榮的世紀；這是一個失落的世紀，也是一個民族自覺最強烈的世紀。從悠遠的歷史底觀點與廣闊的比較底角度來看，這是中國傳統解組的世紀，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世紀。

中國在過去近百年的現代化道路上，有歡笑、有淚鬚，有滑稽突梯，有肅穆莊嚴……這一齣民族的歷史劇現在還未落幕。相反地，它正在生動壯濶地展現著。究實地說，我們並不能確切地知道這幕歷史劇的結局。但我們相信這幕歷史劇不會機械地循著任何先驗的歷史規律發展，它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因這幕劇本中每一個演員的自覺的程度與努力的方向，而走上

不同的結局。

談中國現代化，我們必須了解一個事實，即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雖然已近百年，但人們自覺地掌握這個歷史社會的現象，並有意識地加以象徵化與理論化者，則是相當晚近的事。事實上，中國現代化底經驗現象的發展，遠快過中國現代化底概念與理論的討論與建構。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現代化的概念與理論上的建構，將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經驗底發展。但是，現代化是一極複雜的多層次多方面的現象。雖然目前社會科學對現代化的研究已有相當可觀的成績。但嚴格地說，一般現代化的理論建構還沒有成熟，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尤其尚在雛型的階段。一個不容否認的現象是，今日我們甚至還沒有一個對「現代化」的共同界說，當然更談不上有一個權威現代化的「範典」(paradigm)①。值得欣慰的是，臺灣最近十年來，學術文化界對一般的現代化問題，特別是中國現代化問題不但開始注意，而且作有系統與嚴肅的討論。更有甚者，政府與社會上的領導層在思想上也自覺地熱切地接受現代化的觀念，並積極推動各種現代化的計劃。尤可一說的是，一般的社會民衆也已開始參與到現代化運動的行列中去。我們以為臺灣二十幾年來，特別是最近十年來，其社會文化的基本動向，是中國現代化在廣度與深度上的拓展。

我此文的目的在希望對有關中國現代化的論述或理論以及臺灣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現代化現象提出一些觀察與反省。

一一

我們發現現在許多學者之間，對「現代化」的看法雖然不無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但却也有相當程度的歧異性。有一點是爲作者肯定的，即「現代化」不同於西化，大家都已從五四以來的文化論爭的迷霧走出來了。其次，大家也很清楚地了解到「現代」與否不是一時間的觀念，而是指一實質內涵的觀念，段玉裁曾說：「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爲古，則漢爲今；漢魏晉爲古，則唐宋以下爲今。」（*廣雅疏證序*）這便是從時間的觀點來說的，在這個意義下，現代便等於「當代」了，這當然不是「現代」或「現代化」的實質。但說到現代或現代化的實質，則由於涉及到價值判斷，因此便不易有一共同的界說。譬如說，政治現代化是否一定包括民主化？這便是言人人殊的。如果說必須包括，則蘇聯是否就不是一現代的政治社會？如果說可以不包括，則相信許多人（包括我個人）一定不願有這樣的現代政治。我認爲現代化的最根本的內涵是工業化。現代化不等於工業化。但現代化如不包括工業化是無從談起的。現代社會之基調即是工業社會，我同意法國社會學者艾朗（R. Aron）的說法，工業社會是一主要的歷史概念，是我們了解這個時代特質的重要的鎖鑰，現代社會可以分爲幾種型態，亦即工業社會可以出現不同的型態^①。馬克斯的預言是被歷史否定了。社會主義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社會中出現的。反之，社會主義幾乎都是在與資本主義不搭邊的落後社會出現的。而最可注意的是歷史事實顯示，今日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實際上只是採用與資本主義不同的方式去工業化的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最大的挑戰以及對第三世界的衝激，即在它提供了一條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工業化道路^②。社會主義（常與共產主義連在一起）原來是馬克斯描繪人類歷史發展終程的烏托邦，但到了列寧，特別是史太林手中

才轉爲急速工業化，使蘇聯擺脫落伍的一種手段，撥開漫天飛舞的意識型態的雲霧，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優劣，主要決定於何者能更快速更合理地達到工業化，以及其所出現的工業社會底型態中是否包括更多的非經濟性的價值。通過我們上面對社會主義實質的了解，我們知道一個社會之是否「先進」或「現代」，不在它信奉那種意識型態，而主要地在看它的工業化的程度。以此，在這個世界上，有「開發的資本主義」，也有「開發的社會主義」；有「開發中的資本主義」，也有「開發中的社會主義」。

我前面指出現代化必須以工業化爲基調，這是我相信十七世紀以來建立在牛頓以後導致的科技革命的工業化，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里程碑。科學成爲「了解」世界的根本法門，技術成爲「改變」世界之重要工具。工業化無他，即是基於科技所導出的「經濟」變遷^④。工業化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聲威與力量，這還是次要的。基本的是，它是掌握自然，提高生產力，解決貧窮，增加社會財富與福利的必要途徑。總括一句，工業化是改善「生活質素」之必需（即使非充分）條件，是打倒胡適之先生所說的「五鬼」^⑤的重要法門。不通過工業化，「匱乏的經濟」是無法擺脫的，那樣的話，「精神生活」恐怕只有少爲物質上豐裕的人才能享有，而與絕大多數的人是無緣的。甘地是一個反工業化的人，但他最忠實的信徒尼赫魯却要人民以鋼鐵工廠而不是寺廟作爲新的朝聖地^⑥。我相信就印度情況來說，尼赫魯是對的。

寫到這裏，我希望讀者注意，我說現代化必須以工業化爲內涵，並不絲毫意味我是一個「唯工業化主義」者。中國現代化絕不是主張中國應該盲目地、不計一切地推動工業化。我

個人珍愛自由、人權遠高於工廠、高速公路。我近來聽到有建設「文化大國」的論調，但我相信「文化大國」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經濟結構作基礎。在這裏，我又要鄭重的指出，最近幾年來，西方發生一個大思潮，亦即維護生態及環境的運動。這個思潮指出西方，特別是美國科技與工業的過度發展，羅掘地球的資源，產生各種污染已危害到人類的生存。因此有主張不要再發展經濟，提出「零度成長」(zero-growth) 的概念的人，更有主張要美國等「倒發展」(de-developing)，要開發中社會「次發展」(semi-develop) 者。我個人認為這是過度工業化國家或「工業化後期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 所應有之反省。而這個生態及環境的思潮很快地傳播到亞洲各地區，從而引起了懷疑工業化、懷疑現代化的波瀾並提出對現代化的新檢討。我認為嚴肅的檢討反省是好的，但若一味懷疑，重唱回歸傳統的老調則是亞洲等開發中社會的悲劇。

我認為西方發生的生態及環境的思潮，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即作為現代化基調的工業化，除了上面提到的方法的合理性及其與其他「非經濟性」價值之相容性外，必須尚有一個「程度」的觀念。而決定工業化「程度」則除了資源的考慮外，正需以其他非經濟性的價值為衡準。有些工業化的過度發展顯然浪費了地球的資源，並使經濟價值傷害到其他非經濟性的價值了。在某個程度上，工業化的確會型塑、影響社會、政治、思想、文學等人生的各個面向。但是，我們絕不以為庸俗的馬克斯主義者所持經濟的下層建築決定政治、思想、文學等上層建築的看法有何經驗的意義。社會主義自列寧、史太林以來，清楚地證明一個事實，即政治、思想就馬克斯的術語來說，是上層建築而非下層建築。我們同意韋伯

(M. Weber) 的分析，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是互相影響的。「經濟的命定主義」是社會變遷或現代化理論中的過時貨。在我們看來，工業化是造成許多非經濟之現象的「因」，同時，它也是許多非經濟因素所造成的「果」。

我相信要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速工業化。臺灣的工業發展不是太過，而是不足。那麼我們如何進一步加速工業化呢？在這裏，我們先把工業化看作是「非經濟因素所造成的「果」」。工業化或經濟發展（廣義的工業化）過去是經濟學者的獨占領域。但現在已清楚地了解經濟學者不能單獨負起這項使命，而必須有賴其他社會科學的知識。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的米道爾 (Gunnar-Myrdal) 即是最顯著的例子。他的「亞洲的困窘」(Asian Drama) 一書即是放棄了純經濟學的方法，而採用以多科際為基礎的「制度的方法」的。下面我將選擇二個重要的非經濟的因素來討論它們與臺灣工業化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談的是政治因素。社會學家柏深思 (T. Parsons) 指出西方原初的工業化的動源來自私人資本家。但從事工業化的後來者，則必須以政治權威作為必要的動源^①。他的學生白勒 (R. Bellah) 透過對日本的研究，更強有力地辯稱現代化之動機不必來自經濟底因素。而毋寧是來自政治底因素。他相信政治是推動日本工業化的主力^②。米道爾對蘇聯的工業化更毫不含糊地指出，共產黨人得權後，並沒有出現馬克斯的以「自由王國」取代「必然王國」的夢想，國家不但沒有萎去，而且更以政府控制經濟作為工業化之方法^③。總之，從工業化的類型來說，可分二類：第一類西方原初型態的工業化。這類工業化的動力來

自經濟領域「管理愈少，政府愈好」，這主要是使資本家可以有極大的發展自由。這是以個人爲出發點的。第二類，後期的工業化型態。這類工業化則是一集體意識的活動，工業化成爲社會共同的目的，而政府則比較地說是最具有代表社會整體的機構，因此，不論是信仰什麼意識型態的國家，政府鮮有不採取某程度的計劃經濟的措施。今日開發中的社會大都屬於第二類。在臺灣的工業化過程中，毫無問題，政府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在最早的臺灣土地改革中，政府就居於策劃與推動的地位，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可說奠定了以後工業化的基礎，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中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並一方面導引土地所有者走上了工業建設的道路。一方面使部份農民轉換爲工廠的生力軍。政府在土地改革之同時及以後，一直在工業發展中站在主導與先鋒的戰略性位置。現在，臺灣無論從生產、人口及貿易等結構與組成來看都已是相當快速地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臺灣整個的現代化必須從這個角度來把握它的主線，我們以爲臺灣現代化中最活躍與生猛的面向即是其工業化。而「政治」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顯然是最具決定性的。我們相信政治佔如此重要地位與中國古典社會中政治爲中心結構的傳統現象是有關的。我們以爲通過臺灣工業化的特殊之實例的研究，將豐富一般工業化以及現代理論的發展。但在這一方面，我們工作顯然還沒有擺脫西方的概念範疇。我覺得在這方面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與想像力。就臺灣的經濟發展言，很多經驗的現象是值得在理論上加以探討的，譬如，在政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中，那一類的人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意識型態到底發生多少作用？政治的安定性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又如何？當然，我們對臺灣工業化之研究的興趣不純是學理性的，我們更關心其二十多年來發展的動向。我們在理解政治在

臺灣工業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之餘，必須更檢討那些政治和行政現象是真正促成工業化的動力或助力？那些是造成工業化的阻力？可憐我們對這類問題的研究與探討較少。我個人很粗略地認為，在動力或助力方面，就其笨笨大者來說，政治的安定性是極重要的。沒有政治的安定，臺灣一切經濟計劃或個人經濟（包括外人之投資）的活動就無由實現，或依時循序地進行。許多第三世界社會的經濟之不得發展，主要的致命傷即在政治的動亂。其次，我以為臺灣經濟現代化之得以大力推進，是由於在決策層中有一批對經濟現代化抱有決心與知識的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經濟性的觀點獲得了不受意識型態之實質地干擾的保障，亦即政府的決策層長期以來容忍並鼓勵經濟底或技術底理性有一種高度的自主地位（從另一角度看，這也可說是「政治底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的一種表現）。再者，臺灣的經濟現代化主要地具有一條鞭式的制度與組織之搭配。制度方面如獎勵投資之創立，組織方面如先後有農復會、經合會等之設立而與一般行政機構分離。這些制度與組織使經濟底理性或政策得以具體落實。至於對經濟現代化構成阻力的政治與行政現象，則論者已多。籠統言之，如政治觀念之落伍（如對控制人口的問題即曾激起長時期的意識型態的辯爭，在這些辯論中，顯示了許多人缺乏對人口問題最基本的認識），行政機構之陳舊與官僚化（此存在於各個階層，唯程度不同而已）等，一般地說，政治與行政之結構與行為還帶有濃厚的傳統習性，而不能與經濟發展密切掛鉤。不過，從發展的基線看，我個人以為最近幾年來臺灣工業化之急速發展，經濟動力的質變已經突破政治行政方面的阻力。經濟因素已逐漸擺脫政治行政的從屬地位，而取得本身的自主性，並且已日漸成為型塑、影響政治的性格與發展的因素。這也就是說，經濟已日漸形成本身的運動規律，出現本身的理性

原則，而這種運動規律與理性原則則日漸凌駕政治行政的運動規律與習性之上。這表現了經濟的成熟性格的湧現，但也同時產生了經濟因素侵奪橫虐其他非經濟因素之現象。所以我們研究臺灣的工業化必須注意其發展的階段，注意其與非經濟因素的錯綜的互動關係。我以為當工業化發展到某一緊要的程度（「量」的問題，如羅斯托的「起飛」階段的觀念）時，則其與非經濟因素的關係發生「質」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在討論全面的現代化的動向時，必須把握住經濟價值是否會傷害到非經濟價值的問題。

一一一

其次，我特別要提出來討論的是文化因素。中國傳統社會之未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照章伯的分析，最根本的是由於儒家思想與基督倫理的分別。他說：「儒家的理性主義是對世界的合理的適應；基督教的理性主義則是合理的宰制世界。」^①由於儒家之重與自然和諧，講天人合一，講修己順天，故不能導引出對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變革的心態。韋伯以儒家思想把人安放在一個與自然調和的位置的說法是不錯。這荀子講「大天而思之，執與物畜而制教之」（*天論*）的「戡天主教」畢竟未成儒家思想之主流。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家這種修己順天的心態與控制自然、改變自然的經濟發展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近年來的研究，雖有證據顯示中國自宋以來，即已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②。但此畢竟泰半歸於商人階層，而操中國命運之士大夫則確是對自然的學問興趣少，而偏重於「人事主義」或人事學問。誠然，中國過去的秀異份子的功能是偏向文化性與政治性，而與經濟生產是「隔離」的^③。這一現象自五四以

來已有極大的轉變，今日臺灣的青年已大量地投入科技與生產性的活動中去了，而決策層中也儘多經濟的技術專家（technocrat）。今年夏天我返臺省親，一別七年，面目大新，而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則是一種新型的「文化英雄」的出現，他們當然不是士大夫（早已逐漸消失），也不是政府的官員，甚至也不是科學家，而是經濟上成功的企業家、工業家，大學中極熱門的一系是工商管理。經濟已漸漸成爲社會的中心的價值。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工業社會的具體反映。在這方面，我認爲中國現代化的研究恐怕是相當不夠的。事實的發展已把許多理論拋落在後面了。

我懷疑一百年來特別是五四以來，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已經造成了今日經濟發展的基礎。我覺得通過臺灣現代化之經驗的研究，我們將會更清楚傳統中那些價值已變更失落？那些價值構成工業化的阻力？那些則仍然有力地存在並對工業化發生了積極的功能？這方面需要很精緻的分析。譬如我們常以爲傳統輕商的價值觀有害經濟發展，但實際上，明清以後商人子弟可以參加考試，其社會地位已高（當然要分清商人中巨商與小販之別，過去所謂士農工商只是一種職業的範疇的名稱，而在士農工商各個範疇中則有不同的階層。梁漱溟先生似忽略於此）。民國以還，商人更已不受歧視，而今日則在政府系統性的鼓勵下更不必說了。這個例子只是說明輕商的觀念早已淡薄，而更重要的是，一種不利的社會態度或價值不一定妨害經濟發展。必須在其具化爲政府的行動（如法律）時才可能變爲阻力。我們也可說，一種有利經濟發展的社會態度或價值不一定會促進工業化，但若經政府具體加以獎勵則一定會成爲助力（如政府以法律獎勵從事工業投資）。從臺灣的實例中，我亦懷疑一些認爲由於個人受家族之牽連太廣而減少儲蓄動機的说法是否爲

安樂椅上人類學者的幻想^①。長期以來，中國對土地有情，視土地為唯一經濟價值象徵（賽珍珠的「大地」有生動的描寫）的態度，顯然在臺灣的工業化過程中也逐漸消失了。土地在農業社會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是經濟的來源，但今日則工廠已取代了土地，農人中已有無所惋惜地出賣土地而轉向工業投資的傾向^②。再就工業之推動有賴特殊的人才；特殊的性格系統。具體地說，即需要熊彼得（J. Schumpeter）所說的企業家。麥克蘭德（D. McClelland）認為這種企業家必須具有「成就慾望」。這種說法雖有意義，但却不能解釋中國過去不能出現經濟發展是由於中國人缺乏此種性格系統。中國人向來就有高度的「成就慾望」，問題在於過去社會系統對「成就」之內涵之規定不同，過去衡量成就的標準是對經典之掌握，具有「成就慾望」的人都一窩風地向政府的窄門擁擠。而中國人在香港、南洋一帶在經濟上都扮演了企業家的創業精神，也間接說明了性格系統對經濟發展之重要性不若社會系統為大^③。我個人相信臺灣之工業化的成功原因之一即是社會系統的價值內涵已變，而在臺灣，政府更創造了刺激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從而誘拔出成千上萬的大小企業家，當然，這裏面大不乏企業的投機或冒險家。今後臺灣工業持續的下一階段的發展則不能依賴企業上冒險的品性，而必須更依靠具有理性化的組織與現代化的管理人才，在這裡，臺灣的教育實在有積極培養組織與技術專才的必要。不過，這也不一定說臺灣未來的工廠或其他機構的組織型態與管理方式必須走上英美的道路。假如芮柯耐（Chi Nakane）、唐爾（R. Dore）等人的研究有相當的可信度的話，那麼在日本的工業化過程中，日本的組織型態並未改變，而日本的管理方式顯然是具有其民族特性而十分有效的^④。但我們對中國的管理與組織則顯然還沒有足夠

系統性的分析。我可以說的是，中國清末在「官督商辦」的原則下的辦廠（如漢冶萍公司），則組織鬆弛，管理無方，用人則重關係，做事則但求門面，一派「衙門」氣味。當然非失敗不可。一般言之，臺灣的公私組織與管理距離現代企業之要求甚遠。此處不擬評論。但可一提的是，臺灣學術界目前似已開始重視西方對組織與管理的理論，但對臺灣本身的實際情形則鮮少注意。從而理論與實際發生脫節，據我個人對香港小型工業（五十人以下）的研究，則發現「家庭化」的氣味並不很重，而管理之方式亦日漸受到技術之要求而趨向理性化。所應指出的是，在小型工廠，特別在早期的工業化階段，「家庭化」的組織與管理亦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但當工廠擴大到相當規模時，則「家庭化」的組織與管理將必然不易負起發展的使命。我以為臺灣經濟現代化之是否會繼續成長而成熟，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中國傳統價值或態度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的經驗性的研究應該是文化研究中最大的挑戰，我雖相信大家庭對經濟發展不一定構成阻力。但「多子多孫」的價值則至少會有助於人口的膨脹。而間接地會吞食經濟成果，所幸這種價值觀已經發生變化，但我相信這泰半更是由於臺灣工業化在相當成功後對傳統價值的影響。（此在城市遠高過農村）而在工業化的初期，則在教育（包括大眾傳播）一直未能勇敢的加以改變，這顯示了一個事實，即政府與社會雖很早接受工業化為必要的想法，但過去都傾向於把它看作是一純經濟的問題，而對於有害工業化的傳統價值或未能及早掌握或不肯面對。我個人相信現代化與文化復興是不必衝突的，並即有些傳統的文化因素並非必然有害，更且甚或可以有助現代化的。而有些則與現代化是中立而不相干的，但我們談文化復興必須有個分際，有個警惕。我們決不能把傳統不加分辨地意

理化或浪漫化爲一種理想。今日臺灣的急務畢竟是儘速的現代化。我們不能讓懷古戀往的情緒遮迷了我們未來的路向。

四

我贊成文化復興。但只有在它不害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下贊成，只有在它可以豐富與端正現代化內涵的前提下贊成。在這裡，我們應面對一個臺灣現代化的動向的重要問題，亦即在目前的局面下，我們應該進一步反省，現代化的全面內涵應是什麼？這也就是說，我們希冀創造怎樣的一種社會型態與生活方式？這無疑是一價值判斷的問題。但同時，我們應考慮一相關的問題，即我們用什麼方式去工業化以推動一個健康的現代化，須知，不是我們所希冀的各種價值都是協調與配合的。因此，這涉及了選擇的問題。經濟發展是手段，也是價值或目的之本身，不過它只是整個現代化中許多價值與目的之一個而已。我上面指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線，但却不等於現代化。當工業化與其他非經濟價值發生衝突時，我們就必須作出抉擇。在我個人看，非經濟性價值之抉擇與執着不但會影響工業化之速度，同時會影響工業化的形態甚至整個現代化的內涵。據一種說法，現在我們應把工業化看作造成非經濟之現象的「因」來處理。因此，我們就要問臺灣的工業化是否已經或將會傷害、犧牲其他我們所珍愛的非經濟性價值？如果答案是正的話，則我們就要考慮如何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或深化。這種考慮在理論上有時甚至會需要我們作痛苦的抉擇，即緩慢工業化的脚步。上面所說工業化與非經濟性價值之判斷與抉擇，即是一個經濟現代化與整個現代化的應有之關係與搭配的

問題。這不止是一個現代化上純理論的問題，而是臺灣現代化動向的實際面臨的問題，我們知道，許多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危機，出現了許多令人傷感的現象。因此，我們不能不認真地汲取前人的經驗，以端正我們的方向。臺灣的工業化的程度仍不高，其對社會各面所生正面與反面的作用亦尚未深。因此，我們此時來檢討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我們的檢討究極地說，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怎樣型態的中國現代社會？當然，我們沒有絕對的自由來選擇一個包括一切希冀的價值之社會。事實上，臺灣有太多的天然與人為限制。我們必須認清那些是限制，我們也必須把握時、空的特性，才能作出最理性的抉擇。

在理論上，我們需通過一個政治的過程，以肯定一份必須護衛的中國現代社會的「價值清單」，亦即肯定那些是我們在「現代化」中不可放棄的價值，在此我無意也沒有能提供出一份完整的「價值清單」，不過，未來中國的現代社會必須既是現代底（普通底），又是中國底（特殊底），我們應追求怎樣的價值這個問題，一方面可從傳統遺產中得到啓示，另一方面也可從現代化先進社會之經驗中獲得訊息。這些價值決定後，我們應使之成爲中國現代化的「綱領性系統」，以作爲啓導決定現代化動向的原則。不錯，這種構思，無異說明了我們應該有一社會底與文化的「設計」。這種社會與文化的設計應該一方面避免急功近利的機會主義；一方面避免水中捕月的烏托邦主義。它應該具有可行性的理想主義的色彩，亦應該具有對悠遠的過去與較久的未來的智慧。當然，我並不以爲這種「設計」是容易繪構的，我也不以爲更反對它應該成爲一種硬性的教條。而這個社會與文化的設計的繪構，則必須依賴學術文化界的認真研究，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廣泛對話來完成。